

# 華政權下的中共對外貿易：政策、績效和展望

葉孔嘉

最近數年來，在中共領導階層造成嚴重分裂的許多爭端中，很少像對外貿易政策般地引起激烈的爭論。據傳，「四人幫」意圖限制對外貿易和技術輸入；其餘的，包括鄧小平和李先念等人，則主張進一步地加強對外經濟關係。自從後一集團在華國鋒領導下奪取了政權後，迄今已有十八個月之久。在這期間，中共對外貿易究有何重大改變？華政權的外貿目標和政策與已往的當權者有何不同？中共迅速擴張貿易的企圖又將面臨那些重大的限制？這些都是本論文所要提出的主要問題。

必須加以說明的是，在本論文撰寫之時，關於貿易、援助，以及財政交易的資料仍不太完整。因此，本文僅是嘗試性的研判。

## 一 一九七六年以來的貿易數量和貿易型態

表(一)列出了一九七七年中共進出口貿易數量的初步估計值，以及較一九七六年增加的百分比；同時，亦列出了一九七〇年至一九七六年的對應估計值。一九七七年，中共的貿易總額為一四八億美元，較一九七六年的水準增加了一二%<sup>①</sup>。乍看之下，每年一二%的成長率是相當令人滿意的。然而，此種成長主要說明它已回復到一九七六年經濟緊縮以前的水準。如表(一)所示，一九七七年的一九七五年高峯。由長期觀察，一九七七年中共的對外貿易，實際上並未達到一九七〇年至一九七六年間的水準。中共的外貿經過一年的減緩，它應有較平均成長率為高的成長，才能回復到已往的成長趨勢。但是一九七七年的一二%的成长率。

註① 此估計值係由理查·巴斯薩瓦茲(Richard E. Battavage)與約翰·大衛(John Davie)兩位先生所提供的，係以一九七六年的貿易總值與「新華社」所發表的有關中共一九七七年的貿易總值較一九七六年增加一二%以上的報導(人民日報，一九七八年元月十六日，第三版)為基礎。值得注意的是，此聲明是在一九七七年剛結束的十五天後提出，因此，此數字係初步的估計值。

第二個估計值是一四一·九億美元，此乃日本貿易振興會根據中共與四十五個主要國家的貿易額推算出來的。此數字顯示，一九七七年的貿易總值僅較一九七六年增加了七·八%，遠低於中共官方的估計。(「共同社」東京電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五日)。

第三個資料報導「一九七七年的貿易與一九七六年似乎沒有什麼變化」，並指出「與非共產國家的貿易約與去年相同」。見福克斯·巴特費爾德(Fox Butterfield)「中共的新辯證成長」，紐約時報，國際經濟調查版，一九七八年一月五日，第六十五頁。其他估計則指出，一九七七年較一九七六年衰退(見遠東經濟評論，一九七八年二月三日，三五至三六頁)。

這些有顯著差異的估計值，有一部份是因為在計算中使用不同的匯率，不同的涵蓋範圍以及處理某些項目，諸如運輸成本等方法的不同所造成的。

長率，却遠低於一九七〇年至一九七六年間平均每年二一%的成長率。<sup>(2)</sup>

就絕對條件而言，中共在維持出口成長方面比進口成長做得更好。自一九七〇年以來，中共的出口持續成長，而達到一九七七年最高的峯。一九七七年的進口，則仍遠低於一九七四年的水準。但若與一九七〇——七六年平均每年成長率相比較，則一九七七年出口與進口值的回復速度均不足以達到已往的成長趨勢。

表(1)亦顯示，一九七七年，中共有十億美元的貿易盈餘，略低於一九七六年的水準<sup>(3)</sup>。然而，一九七六年，中共的債務總計超過了十億美元。同時，由於一九七四——七五年間大規模進口的欠款尚未完全付清，則一九七七年的債務必然相當的高<sup>(4)</sup>。果真如此，則一九七七年的貿易盈餘，固然有助於中共的財政，但却不可能顯著地增加其外匯準備<sup>(5)</sup>。

一九七七年，中共的進口商品結構有幾項重大的發展，值得加以注意：

(1) 中共突然和大規模的購買農產品，包括穀物、大豆和砂糖。中共業已訂購了空前大量的穀物，總計約一千一百四十萬噸，並預訂於一九七七年和一九七八年初交付<sup>(6)</sup>。據估計，一九七七年中共穀物的進口，約為七百萬噸，這是自一九六一年中共開始進口穀物以來的第二大進口量，並且是一九七六年的三倍半以上<sup>(7)</sup>。此種猝然增加的穀物進口，並非首創，早在一九七三年亦發生同樣的情況。有趣的是，兩次的穀物猝然進口均發生在急進派失勢之時。在急進派當權的數年間，譬如一九六七年——七〇年，和一九七五——七六年，中共穀物的進口低於一九六一——七七年間平均每年五百噸的水準。關於一九七七年穀物的進口，另一值得注意

一九七〇——七六年間的成長率是根據以當前價格計算的貿易總值推算而得，因此，同時反映了價格的上漲和真實的成長。但其平均成長率却極不可能低如一二

%。或許有人會主張，若用較長的趨勢（譬如，一九六五——七六）來評定一九七年的實績，則將使一二%的成長更為可靠。這雖是事實，但是利用一九七〇年代為基礎却有兩個令人信服的理由。首先，除了肅清「四人幫」以前的短暫時期外，中共的領導權大致是掌握在目前當權的同一集團手中。其次，一九七〇年代中共的生產與出口的能力較一九六〇年代為強。因此，在相同的領導者與同樣的經濟基礎上來觀察其貿易實績，是極為合理的。

關於若干估計中共貿易盈餘的爭論點，可參閱遠東經濟評論，一九七八年一月三日，三五——三六頁。  
註(3) 據理查·巴斯薩瓦茲 (Richard E. Battavage) 和約翰·大衛 (John Davis) 的估計，中共一九七五年與一九七六年的債務分別是八億九千五百萬美元與十億七千五百萬美元。

註(5) 國際清算銀行 (The Bank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的會員銀行對中共中國銀行的債務，由一九七六年底的十四億美元增加到一九七七年九月底的二十億美元，此顯示這些銀行所把持的中共外匯數目的增加。但這數字並不能完全代表中共的外匯狀況，因會員銀行以外的銀行所把持的中共外匯，在同一期間內的增減則不得而知。

「共同社」東京電，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五日。

註(6) 關於一九六一——七七年的穀物進口，參閱中共·經濟指標 (*China Economic Indicators*)，華府·國家對外評估中心，一九七七年，三七頁。中共·國際貿易，一九七六——七七年 (*China International Trade*, 1976—77)，華府·國家對外評估中心，一九七七年，一六頁。「共同社」東京電，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五日。

表(一) 貿易數量 一九七〇—七七年

數量 (百萬現值美元)	較前 百分比變化 (%)	一九七六年平均成長率
四三四四四〇六四四	一一一	總
八二五五〇三〇八三	一一一	值
〇五七八〇〇一四	一一一	出
〇五五〇〇〇〇〇〇	一一一	口
七七七六五三二二	一一一	進
九二一六〇一五〇	一一一	口
〇五八六七五〇九	一一一	值
〇〇〇〇五〇〇五	一一一	差
六六七七五二二二	一一一	額
九〇三四二八三二	一一一	
〇〇九二二五一四	一一一	
〇五五〇五〇〇五	一一一	
負	一一一	
一一負四八二	一一一	
七四八〇二三三二	一一一	
···	一一一	
八九八三〇三四九	一一一	

資料來源：一九七〇——一九七六年的資料取自中共・國際貿易，一九七六——七七（*China: International Trade, 1976—77*），華府・國家對外評估中心，一九七七，第九頁。一九七〇——一九七一年的資料業經著者修正。一九七七年的資料係由美國政府的理查・巴斯薩瓦茲（Richard E. Batsavage）和約翰・大衛（John Davie）所提供的初步估計值。

的特性是，中共並未向美國進口。這與一九七三年的七百七十萬噸穀物進口中，有一半以上是來自美國的情況大異其趣<sup>(8)</sup>。除了穀物以外，一九七七年中共亦購買了大量的砂糖和大豆。中共歷年來均會進口砂糖，但此次採購的特色在於其非常龐大的數量一百五十萬噸，約為一九七六年的兩倍半<sup>(9)</sup>。大豆的進口更呈現了另一不同的景象。在一九七三年中共進口二十五萬一千噸大豆以前，大豆一直是中共的主要出口產品。一九七四年，中共大豆的進口增加到六十一萬九千噸。一九七五——七六年間，則減少到三十萬噸左右，而一九七七年，又再次地遽增到四十萬噸。

(2) 工業補給品，諸如鋼鐵和化學肥料等的進口均略有增加。鋼鐵的進口，由一九七六年的四百五十萬噸增加到一九七七年的五

註(8) 許然，一九七八年四月，中共向美國購買了二千二百萬蒲式耳的小麥。（華盛頓郵報，一九七八年四月十五日，D一一頁）。

百萬噸，而化學肥料則由二百五十萬噸增加到三百萬噸左右<sup>⑯</sup>。

(3) 當一九七三——七五年間所訂購的整座工廠大部份完成交付之後<sup>⑰</sup>，中共機械設備的進口，由一九七六年的十五億美元減少到一九七七年的十億美元。然而，在這一類的進口中，舊船、石油裝備及其有關的設備的購買却增加了。整座工廠進口的契約，亦由一九七六年的一億八千五百萬美元急遽地減少到一九七七年的五千九百萬美元<sup>⑱</sup>。此項進口的減少，顯然與一九七六年底中共官方所作準備增加海外技術進口的聲明相矛盾<sup>⑲</sup>。這可能是重新調整發展計劃及安排優先發展順序的延緩，而減低了新合約談判的速度。

(4) 原油的出口，總計達七百四十八萬噸，較一九七六年增加了六·八%<sup>⑳</sup>。然而，石油產品却由一九七六年的一億七千五百萬美元降低到一九七七年的一億三千萬美元<sup>㉑</sup>。農產品和紡織品的出口（以價值為基礎）則略有增加。

當商品的型態改變時，中共與各個貿易夥伴的貿易數量亦有所變化。一九七七年，中共與日本的貿易有顯著的增加，而達三十億美元，主要是由於中共購買了大量的鋼鐵和肥料，並且石油的出口也有少量的增加。一九七七年，中共與香港的貿易，由於香港吸收了更多的中共出口商品而達到新的紀錄。中共與澳洲以及加拿大的貿易亦有所增加，主要是由於中共增加了穀物的進口。至於與美國的貿易，亦因中共購買美國的棉花和大豆而增加。其他與中共貿易有所增加的夥伴便是第三世界的國家。

在與中共貿易反而減少的國家中，最值得注意的便是西歐和蘇聯。一九七七年，中共與西歐的貿易值，因整座工廠的交付已大致完成而下降。其中法國與西德減少了百分之五十以上。同時，中共與蘇聯的貿易，亦因某些難以捉摸的理由而減少了百分之二十左右。

總之，一九七七年的貿易實績，證實了中共對重建貿易水準所做的實際努力和進展。但是重建工作並未完成。貿易並未快速的成長，以達到一九七〇——七六年的成長趨勢所設定的水準。進口的增加，主要是由於供消費的農產品的進口所致，因此只賸下較少的資源以供資本設備和生產財的購買。石油出口只有略微的增加。總出口的增加仍然嚴重地依賴於紡織品和農產品的出口。

註<sup>㉒</sup> 同註<sup>㉓</sup>。

註<sup>㉔</sup> 中共・國際貿易，一九七六——七七，一八頁。

註<sup>㉕</sup> 此乃中共外貿部長李強，在法國國家雇主會議所做的聲明。海外廣播情報中心，每日報導——中共(*Daily Report—PRC*)，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八日，A一頁。

註<sup>㉖</sup> (此後將只稱其為每日報導)。

註<sup>㉗</sup> 「共同社」東京電，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五日。

註<sup>㉘</sup> 同上・中共・國際貿易，一九七六——七七，一二頁。

## 二 華政權的外貿政策

前述關於貿易型態的改變，乃係許多因素共同造成的效果。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共加速經濟成長和推動出口的承諾，以及某些結構上和制度上的限制，限制了貿易的擴展。茲先就華政權經濟發展的目標和對外貿易政策，加以檢討。

當前中共領導者最重要的目標便是加速經濟成長<sup>⑯</sup>。依照華國鋒的規劃，在一九七八——八五年間，農業生產每年增加四—五%，工業生產則每年增加一〇%以上<sup>⑰</sup>。這些目標遠低於周恩來在大躍進時期所設定的水準：農業和工業生產每年分別增加四五%和二五%<sup>⑱</sup>。不過，這些仍是難於完成的任務，因其所定目標均遠高於已往的實績。在一九五九——七六年間，中共農業和工業生產的成長率分別是百分之二和百分之九<sup>⑲</sup>。目前最重要的問題是中共領導者將如何計劃來完成這些目標。

華國鋒的發展策略，簡言之，是一種以農業為基礎、技術為主導以及對外進取的政策。在華國鋒的規劃中，優先發展的部門是農業和基礎工業，諸如鋼鐵、電力、燃料、原料和半加工原料工業，以及運輸、通訊等。至一九八五年，中共糧食的產量將由一九七六年的二億八千五百萬噸，增加到四億噸；鋼產量亦可由一九七六年的二千三百萬噸增加到六千萬噸<sup>⑳</sup>。煤炭產量在一九八五年將倍增，且在本世紀結束前將達三倍之數<sup>㉑</sup>。因此，中共計劃增加農業部門的投資，並興建一二〇個大型項目，其中有十個鋼鐵基地，九個有色（非鐵）金屬基地，八大煤炭基地，十大油氣田，三十個大電站，六條鐵路新幹線和五個重點港口<sup>㉒</sup>。其計劃着重在這些工業，便顯示華國鋒須放棄大躍進時代以來的優先序列：農業、輕工業和重工業，並且置重工業於輕工業之前。總之成長的過程本質上在於農業和工業部門間資源的流通，再輔以技術、設備和其他原料的輸入。上列圖表以箭頭指出華國鋒計劃的流通方向<sup>㉓</sup>：

<sup>⑯</sup> 華國鋒自己的談話，「要在本世紀內把我國建設成爲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需要在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外交等各方面，進行緊張的工作和鬥爭，而高速度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歸根到底具有決定性的意義。」，並又指出「團結起來，爲建設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而奮鬥」。北京周報，一九七八年，第十期，一八頁。

<sup>⑰</sup> 同註<sup>⑯</sup>，一九頁。

<sup>⑱</sup> 周恩來，「關於調整一九五九年國民經濟計劃主要指標和進一步開展增產節約運動的報告」，新華半月刊，一九五九年，第十七期，一二二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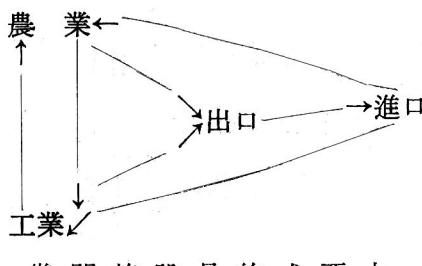
<sup>⑲</sup> 中共・經濟指標（*China : Economic Indicators*），一九七七年，三頁。

<sup>⑳</sup> 關於計劃的目標，參見華國鋒，見註<sup>⑯</sup>一九頁。至於一九七六年的產量，見中共・經濟指標（*China : Economic Indicators*），一九七七年，一頁和二二頁。

<sup>㉑</sup> 每日報導（*Daily Report*），一九七八年元月五日，E一〇頁。

<sup>㉒</sup> 華國鋒，見註<sup>⑯</sup>，一二一至二三頁。

<sup>㉓</sup> 箭頭並不能顯示流通的數量。必須注意的是，出口值和進口值與農業和工業產值相較之下，却相對的小。



華國鋒的策略，既不同於幾乎全以資本形成為重點的第一次五年計劃，也異於完全依賴勞動力的毛澤東大躍進計劃。它着重於所有的主要投入因素・勞動（增加工資便是例證），資本形成，經營管理，以及最重要的技術。技術是當前推動經濟成長和現代化的關鍵。但是，中共目前遭遇到文化大革命和輕視科技的教條式教育政策所遺留的影響。因此，中共與先進國家的科技能力的差距加大，使它不能不仰賴於海外現代科技的注入，以求達成其虛飾的目標<sup>24</sup>。基於此一理由，對外貿易便被指定在其發展計劃中擔任重要的角色。貿易提供了一條有利的途徑，使國內經濟資源（諸如石油）的動員，得以轉換成加速經濟發展所必須的技術和設備（諸如尿素工廠）。中共領導階級中的顯貴，包括華國鋒、鄧小平、李強等人，均表示過促進貿易的願望。當然，此種對外進取的姿態並非始於今日，而與一九七〇年代初期周恩來所設計以及一九七三—七四年間鄧小平所大力推行的政策，頗相類似。但是，二者在內涵與重點方面略有不同。華國鋒的外貿規劃有下列幾項特點：

(1) 以石油換取技術。一九五〇年與一九六〇年代，中共的出口商品，主要包括農業和有關的產品，以及錫、銻和鎢等礦產品。這些產品在一九七〇年代依然佔着相當的份量；然而，石油——出口商品中的新項目，却逐漸地增加其重要性。一九七三年，中共首次進行其石油的輸出。至一九七五年，石油輸出達一千一百萬噸，其總值，包括石油產品在內，計達九億一千萬美元（約佔總出口值的一三%），幾乎與中共的主要輸出品紡紗和紡織品同值<sup>25</sup>。但是，據傳由於「四人幫」的反對，一九七六年中共的石油輸出急遽地減少。一九七七年，則又回復了成長的趨勢。中共領導者擬大規模地以石油換取技術的意圖，可由最近中共與日本間的貿易協定得到證實。在一九七八—八二年間，中共準備向日本購買七十至八十億美元的工廠和技術，以及二十至三十億美元的建築材料和設備。另一方面，在同一時期內，中共將向日本輸出四千七百萬噸的石油，五百十五萬至五百三十萬噸的焦煤，以及三百三十萬至三百九十萬噸供發電鍋爐用的煤炭<sup>26</sup>。據報導，除日本外，中共對法國亦進行同樣的貿易方式<sup>27</sup>。實際上以鋼鐵為例。一九七五年，中共鋼鐵產量達三千五百萬噸，總能量不可能遠高於此水平。中共為達到六千萬噸的目標，在八年內須加新的能量為三千五百萬噸，或相當於過去二十八年所增加的能量的一・四倍。正如所料，中共要求日本鋼鐵公司予以技術協助，在上海建立一擁有六百萬噸能量的新工廠，並協助鞍山和武漢兩鋼鐵廠提高生產能量。中共亦要求日本钢管株式會社及其他主要的鋼鐵製造者，協助北京附近的鋼鐵廠提高三倍生產能量。參閱日本經濟雜誌，一九七八年三月十四日，八頁。

中共・國際貿易，一九七六——七七，二二頁。

註<sup>24</sup> 華盛頓郵報，一九七八年二月十七日，一頁和二三頁。

註<sup>25</sup> 中共提議輸出五十萬至一百萬噸石油到法國（「法新社」北京電，一九七八年元月二十五日）。此符合了鄧小平一九七五年的政策報告「我們不可只向日本出口，我們可在西歐找到銷路，銷售到西德和法國，並且我們可以得到許多好的東西。」（中共貿易報導，一九七七年七月，三頁。）

，中共是企圖以其天然資源換取海外的技術。此種政策雖非首創，但却從未像華政權一樣強而有力地推行過。

(2)以勞動換取資本。華政權外貿規劃的另一顯著特色，是重新致力於轉換勞動力為資本。目前中共加緊推動由進口纖維製成的紡織品的出口，便說明了此一論點。因為一九五〇年代，中共是紡織纖維的純進口者；一方面為了增加合成纖維和長纖維棉花的供給，一方面也為了減輕土地的人口壓力。一九六〇年代，中共棉花的進口仍然相當穩定，每年的淨進口約為四十三萬包<sup>①</sup>。一九七一七七年間，平均每年的淨進口急遽地增加到九十四萬二千包。在此期間，並沒有關於大陸人民棉布配給顯著增加的報導；然而，紗、紡織品和衣類的出口，却由一九六五年四億八千五百萬美元，急速地增加到一九七六年十六億五千五百萬美元<sup>②</sup>。顯然地，自一九七〇年代初期開始，中共便利用進口的棉花和合成纖維，以製紡織品、衣類以及出口的紡織品。此種政策的理論根據並不難瞭解。對外貿易僅是被利用作為藉勞動密集產品（由進口原料所製成）的出口，使大陸內部豐富的勞動力轉變為極為短絀的外匯的手段而已。因此，「四人幫」便有充分的理由，以控訴鄧小平集團藉製造品的方式輸出勞動力<sup>③</sup>。職是之故，棉花的進口，由一九七三年的一百八十萬包猛降到一九七六年六十萬包，然而，一九七七年又回復到一百三十萬包<sup>④</sup>。有數項跡象顯示，中共當前領導者欲遵循這些路線來擴展貿易。據報導，一九七七年四月，李強曾向日本國際貿易促進會會長藤山建議，中共願意將日本紡織品染色和加工處理，並再輸往日本<sup>⑤</sup>。今年年初，中共曾向海外華僑提出此種加工處理區的計劃。華僑被要求在中共提供建廠基地和勞動力的條件下，在廣州設立工廠，而所生產的產品將從事於出口<sup>⑥</sup>。

中共極力強調旅遊業，是它意圖利用豐富的勞動力以賺取外匯的另一徵候。一九七八年二月，中共召開了全國旅遊工作會議。其主題乃是做好擴展旅遊貿易的各種準備<sup>⑦</sup>。

此種勞動力輸出的政策亦非前所未見<sup>⑧</sup>，但已往的領導者却未曾如此熱心地推動。極為諷刺的是，此種着重中共比較利益的對

註<sup>①</sup> 美國農業部，外國農業報導——棉花（*Foreign Agriculture Circular-Cotton*），一九七七年五月，三〇頁。此數字依據八月一日開始的全年度計算。

註<sup>②</sup> 關於一九六五年紡織品和衣類的出口，參閱鮑薩克（A.H. Usack）和巴斯薩瓦茲（R.E. Batsavarage），「中共的國際貿易」，《中共·經濟評估》（*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An Economic Assessment*），華府：美國政府印刷局，一九七一年，二五三頁。一九七六年的數字取自中共·國際貿易，一九七六—

七七，一—頁。須加以注意的是，數值的增加部份是由於價格的改變。

註<sup>③</sup> 人民日報，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三日，第五版。

註<sup>④</sup> 外國農業報導——棉花，一九七七年五月，三〇頁。一九七七年的數字是由理查·巴斯薩瓦茲和約翰·大衛所提供的。

註<sup>⑤</sup> 日本經濟新聞，東京，一九七七年四月十七日，第四版。

註<sup>⑥</sup> 每日報導（*Daily Report*），一九七八年二月七日，E一六頁。

註<sup>⑦</sup> 每日報導，一九七八年一月三日，E一頁；北京周報，一九七八年第七期，四頁。中國大陸的第一個旅行團是由美國和其他航空公司所組成，得到了華政權欣然的批准。

註<sup>⑧</sup> 一九五八年，中共曾指出，每一噸進口的棉花利用於出口紡品的製造，可淨賺七千二百元（人民幣）的外匯。計劃經濟，一九五八年第一期，三一頁。

外進取策略，正違反了毛澤東經濟自給自足的政策<sup>⑳</sup>。毛澤東思想和華國鋒政策間的矛盾，或許是今後華集團和急進派間爭論、乃至於權力鬥爭的另一原因。

(3) 着重於支持出口的進口。一九七七年，機械設備和技術進口的型態，顯示出中共的輸入重點，有所改變，而偏重於其出口所極端依賴的部門，主要是有關能源和農業的部門。此種政策首次出現於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八日鄧小平的談話中。他主張進口國外的採煤設備，以利於煤炭出口的目標<sup>㉑</sup>。最近，李先念亦表示同樣的願望，擬以石油換取美國的石油探勘設備<sup>㉒</sup>。因此，自華國鋒掌權之後，中共對於石油探勘設備、石油裝置、煤炭處理設備、核能技術等等，頗感興趣。根據不完整的統計資料顯示，石油有關設備的進口，由一九七五年的九千二百萬美元急遽地下降到一九七六年的九百萬美元，但一九七七年又回復到三千三百萬美元<sup>㉓</sup>。同時，一九七八年初，中共向日本購買了兩艘探測船，以從事石油和油氣的探勘<sup>㉔</sup>。

化學肥料工廠和肥料的情況，亦復如此。一九七〇年代，中共進口了大量的化學肥料廠和肥料，一方面是爲了維持由農業原料所製成的農產品和製造品出口的成長；另一方面，則爲了滿足繼續增長的國內需要。一九七三年，中共購買了大批的肥料工廠，總值約達四億美元，其中包括向卡洛格大陸公司（Kellogg Continental）購買的三個尿素工廠，向日本購買的一個肥料廠，由卡洛格公司（M. W. Kellogg）進口的八個氨水工廠，以及由法國的伊爾第公司（Heurtey）進口的一個肥料工廠。此後，只曾在一九六六年與日本鋼管訂定了購買一個氮水工廠的契約。華國鋒當權之後，中共似乎又恢復了購買此種工廠的興趣。一九七七年七月，一個龐大的代表團訪問了四個歐洲國家中出售肥料工廠的公司<sup>㉕</sup>。化學肥料廠亦是中共與日本長期貿易協定中，機械設備進口的主要項目。肥料進口的情況亦相同：一九六六年以來，肥料的進口，每年約在三百萬至四百萬噸之間<sup>㉖</sup>。一九七六年肥料進口量大爲減少，約爲二百五十萬噸，但一九七七年又回復到三百九十萬噸<sup>㉗</sup>。

(4) 對海外軍事設備和技術深感興趣。在「四人幫」肅清以前的數年間，中共曾向西方購買許多重要的國防有關的設備，包括：

註<sup>㉘</sup> 見毛澤東對國際專業化概念的批評。（毛澤東思想萬歲，一九六九年，三七八至三七九頁）。

註<sup>㉙</sup> 中共貿易報導（*China Trade Report*），一九七七年七月，二頁。

註<sup>㉚</sup> 華盛頓郵報，一九七七年八月二十二日。

註<sup>㉛</sup> 任歐拉夫·威廉斯（Jan-Olof Willums），「中共海岸石油」，中共商業評論（*The China Business Review*），第四卷，第四期（一九七七年，七至八月）。

註<sup>㉜</sup> 「共同社」東京電，一九七八年一月二十二日，一〇至一頁。

註<sup>㉝</sup> 明報，香港，一九七七年七月四日，第四版。

註<sup>㉞</sup> 中共·國際貿易，一九七六——七七，一六頁。

註<sup>㉟</sup> 一九七七年的進口資料係由約翰·大衛所提供的。

一九七一年向美國購買十架具有慣性導航系統的波音七〇七飛機，以供長程軍事運輸之用；一九七三年向法國購買了十三架具有監視雷達設備而適於援救任務、邊界管制和反潛艇作業的 Super-Frelon 直昇飛機；一九七五年由資料管制電腦公司（Control Data Corporation）進口一部精密電腦（Cyber 172）；一九七六年向英國的羅斯·勞伊公司（Rolls Royce Company）購買五十個 Spey-Bla 噴射引擎。在此期間，中共亦會探詢洛克希德公司的 C-141 型貨櫃運輸機，Itak 公司的衛星照相機，以及 RCA 全球通訊公司的雷達和通訊設備。顯然地，這些購買和接觸反映出，中共意圖現代化其仍然停留在一九五〇年代技術水平的軍事設備，以及發展其國防工業的目的。同時，中共對於先進技術、樣本設備和技術援助的選擇性購買，比對大規模現成武器的獲得，較有興趣。

同樣地，中共領導階層對於海外的軍事技術，亦極有趣，據報導，一九七七年年底，中共計劃由法國獲得兩種型式——Exocet 和 Crotale——的精密飛彈<sup>④</sup>。中共亦正與西德進行商談，以購買三十架備有反戰車飛彈的 BO-105 直昇飛機<sup>⑤</sup>。一九七八年初，在日本出口管制調整委員會的批准下，中共會向日本的日立公司購買三部大型電腦（一部 M170 和兩部 M160I）<sup>⑥</sup>。「共同社」亦曾報導，中共向蘇聯購買米格-113（MIG-23）戰鬥機，以及意圖自埃及獲取山姆（SAM）地對空飛彈、MAT 反戰車飛彈和 T-62 坦克<sup>⑦</sup>。同時，中共亦曾與法國交涉，以購買高度精密的電子偵測裝置、HOT 和 Milan 反戰車導引飛彈、軍事運輸機和 Puma 直昇飛機<sup>⑧</sup>。較有趣的報導是，當李強訪問法國時會表示，中共有意購買三百架由英國 Hawker Siddeley 公司所製可以短距離垂直起飛和着陸的哈瑞（Harrier）式戰鬥機<sup>⑨</sup>。這些均符合華國鋒所作中共並不排除向海外購買武器之可能性的聲明，也與鄧小平關於中共準備進口武器的談話相符<sup>⑩</sup>。大規模哈瑞式戰鬥機的購買，顯然違反了已往只進口樣本武器而不大量進口現成武器的政策。

到目前為止，中共對於軍事設備和技術購買的試探性接觸頻繁，但實際購買的數量仍相對的小。這一方面是由於中共有限的吸

註<sup>④</sup> 「共同社」東京電，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日。Exocet 是全天候艦對艦飛彈，其最大射程是七十公里，並可載運任何型式的海軍飛機。Crotale 是地對空和艦對艦飛彈，其最大射程是八十公里。

註<sup>⑤</sup> 「共同社」東京電，一九七八年元月卅一日。

註<sup>⑥</sup> 「共同社」東京電，一九七八年二月一日。

註<sup>⑦</sup> 「共同社」東京電，一九七八年元月十九日。

註<sup>⑧</sup> 「共同社」東京電，一九七八年二月三日，二六頁。

「遠東經濟評論」，一九七八年元月卅一日。較早以前，王震亦向一個英國商業訪問團表示，中共意圖購買哈瑞式戰鬥機。遠東經濟評論，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九日，二八頁。

大公報，香港，一九七六年九月七日，第二版。紐約時報，一九七七年十月廿二日，一九頁。

註<sup>⑩</sup>

收能量以及外匯的短絀；一方面則是中共領導階層內部，又發生了國防與經濟成長間資源分配政策的爭論。

(5) 較為軟化的對外借貸立場。最近中共與日本和歐洲共同體的貿易協定均具有一共同的特性——只要日本和歐洲共同體增加自中共的進口，中共亦願意增加自這些國家的進口。華政權似乎較其所有前任更渴望於平衡雙邊貿易。然而，此種政策顯然不適用於對中共有貿易逆差的貿易夥伴，諸如香港和新加坡。此種差別待遇的理由似乎是外匯的短絀。同樣的理由亦迫使中共採取較軟化的借貸立場。在許多情況下，中共顯然不願接受外國的投資、財政或物質的援助，乃至於與其他國家的聯合事業<sup>①</sup>。此種相當保守的對外借貸態度，或許源於較早以前對蘇聯所留下的痛苦經驗，以及極力宣傳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則。不幸地，此種政策的根源却形成了中共貿易擴張的限制。因此，最近數年來中共已背離了此種既定的政策，華政權的領導者，且正尋求融通進口資金的方法<sup>②</sup>。中共規避此種「不借款」原則的重要方法，便是延期支付的利用。目前工廠和機械設備進口的典型方式，是中共在交貨前，先付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的價款，其餘則在以後五年，依年息百分之六，分期攤付。此種方式具有了財政借款的每一特質，但是中共却拒絕承認這是一種借款。事實上，一般的出口者向進出口銀行借款，以融通此種交易，最近鄧小平在接見法國報界董事訪問團時，終於承認延期支付具有短期借款的意義；並表示中共只有在能償付的條件下才採取此種方式<sup>③</sup>。更重要的是，華政權的領導者曾要求日本予以十年的償付期限<sup>④</sup>。不僅如此，中共目前準備直接接受西德銀行資金的融通，以作為向西德公司進口的依據。此種安排是趨向於更軟化的借貸方式的一小步；亦不同於由供給者所安排的具有商業貸款形式的延期支付。

第二種偽裝借款的方式，是中國銀行與歐洲和日本的銀行間的互惠帳戶。外國銀行儲存強勢貨幣於中國銀行（據估計，一九七七年約為五億美元），而中國銀行亦儲存等額的人民幣於外國銀行。人民幣是一種非兌現貨幣，但是存儲於中國銀行的其他貨幣却是兌現貨幣，而可用於融通中共進口所需的資金。事實上，中國銀行是以非兌現的人民幣作為擔保，向外國銀行無息借款<sup>⑤</sup>。

類似的方式是中國銀行與外國銀行相互儲存第三種貨幣。當外國銀行儲存於中國銀行的數額大於中國銀行儲存於外國銀行的數額時，則事實上便形成了中共向外國銀行的借款；同時，在這種情況下，中共只對淨差額支付利息<sup>⑥</sup>。據報導，一九七五年底，當「四人幫」得勢之時，日本銀行對倫敦中國銀行有一億美元的淨差額。日本銀行在北京的要求下，澈底地減少其差額。然而，一九

註<sup>①</sup> 例如，參閱日本貿易振興會中共報導(*Japan China Newsletter*)，一九七七年十月，第十四期，一八頁。

註<sup>②</sup> 「共同社」東京電，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廿四日。

註<sup>③</sup> 每日報導(*Daily Report*)，一九七七年十月廿六日，A一四頁。

註<sup>④</sup> 日本貿易振興會中共報導，一九七七年十月，第十四期，一八頁。

註<sup>⑤</sup> 彼得·維特魯伯(Peter Weintraub)，「判斷的日子來臨」，遠東經濟評論，一九七七年四月八日，八一頁。

註<sup>⑥</sup> 粟野源進，「當日本存款，中共借款」，遠東經濟評論，一九七四年六月十七日，四二頁：「中共尋求更多的信用」，遠東經濟評論，一九七七年五月廿七日，七八頁。

七七年，北京復表示，渴望於回復並擴大此種互惠帳戶的方式<sup>⑦</sup>。當中共與日本貿易協定簽訂後，日本的銀行立即準備儲存日幣於中國銀行，並考慮對於日本的進口予以預先支付，而中共的外匯和國際清算銀行亦存錢於日本的銀行<sup>⑧</sup>。

最後，中國銀行與中共在香港擁有或管制的其他銀行，均收到了定期存款。事實上，這是個別存款者以兌現貨幣給予中共的中期貸款。據日本銀行總裁柏木雄介表示，最近中共在這一方面有進一步的發展。中共外貿部副部長劉希文、中國銀行行長喬培新和其他領導人均會表示，中共將支付百分之六至六點五的利息<sup>⑨</sup>，以接受海外的存款<sup>⑩</sup>。

中共何以寧願採用偽裝的借款，而不願直接接受外國銀行借款呢？理由實在不難瞭解。在政治上，這有助於中共保全其沒有外債的虛有幻象；在經濟上，因存款利率較一般銀行貸款為低，中共可以得到低成本的融通資金。但是，不論何種理由，顯而易見的是，華政權對於對外借款已採取了較軟化的立場。

(6) 學習現代推銷技術。自一九六〇年代初期，中共的外貿由共產集團轉向西方市場，迫使中共在對外貿易上採取新的觀念和途徑，諸如多邊平衡的觀念、貿易展覽會和商業信用的使用等。現在中共領導者正擬進一步擴展它在先進國家高度競爭的市場的貿易，更覺得有其現代化推銷技術的必要。中共外貿主管業已知道在處理諸如標籤、規格和保證交貨日期等方面採取較為合作的態度。中共為了保證供應並為了符合國際市場品質的標準，現正設立特定區來生產出口商品；而設備較佳的工廠，亦被指定為出口工廠。此外，價格的調整，時間的掌握，產品和市場的選擇，以及各種貿易方式的利用，均着重彈性的調整。中共也認識了市場調查的重要性<sup>⑪</sup>。中共主動地派遣代表團到美國學習包裝技術和消費者的嗜好，這證實了它學習現代貿易技術的意圖。同時，中共亦派遣許多貿易代表團赴海外訪問、舉辦新產品展覽，以及積極地參加世界各地的商展等<sup>⑫</sup>。

中共新的外貿規劃是否意味着貿易方向的改變？或許不是。已往，中共貿易方向的特徵是，西方市場掌握了中共的對外貿易，形成了中共主要的貿易夥伴；而香港和其他東南亞國家，却是中共支付由先進國家進口所需外匯的來源<sup>⑬</sup>。中共與西方的貿易似乎元。（遠東經濟評論，一九七七年四月八日，八一頁）。然而，一九七七年，中共是否又回轉到倫敦銀行界市場，則不得而知。

註<sup>⑭</sup>

「共同社」東京電，一九七八年二月十六日。

註<sup>⑮</sup>

東京產經新聞，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三日，九頁。

註<sup>⑯</sup>

遠東經濟評論，一九七七年四月八日，八一頁。

註<sup>⑰</sup>

李強，「分清路線是非，積極發展社會主義對外貿易」，紅旗，一九七七年，第十期，三四至三七頁。

註<sup>⑱</sup>

蔡明欽，「共匪對外貿易動向研析」，中共研究，一九七七年，第十一卷，第十一期，一九至三五頁；袁篤信，「當前共匪外貿政策的轉變及其作用」，匪情月報，一九七八年，第二十卷，第七期，六四至六九頁。

註<sup>⑲</sup>

李強，見註<sup>⑰</sup>，三四頁。

不會相對減縮其與共產集團的貿易。同時，中共、香港和先進國家間的三角貿易關係，也不會有所改變。儘管如此，仍有數種跡象顯示，中共將針對下列地區來擴展其出口貿易：

(1) 日本。「四人幫」攻擊鄧小平的理由之一是，鄧小平集團只對與第二世界貿易，具有興趣。此種攻擊並非沒有根據。如表二所示，一九七〇年與一九七五年，中共與第二世界的貿易，約佔其總貿易額的百分之六十。在這一集團的國家中，日本與西歐最為重要，約佔中共總貿易額的百分之四十五。一九七六年，第二世界在中共總貿易額所佔的比率衰退，尤其是日本。然而，最近種種跡象顯示，中共領導階層又積極地擴展與日本和歐洲經濟共同體的貿易。一九七七年，中共與日本的貿易較一九七六年增加了百分之十六，遠高於中共百分之十二的總貿易額成長率。最近，中共與日本的長期貿易協定，期望在八年之間（一九七八—八五年）雙邊貿易可達二百億美元。此數字與過去八年（一九七〇—七七年）的一百八十四億美元相較，並不很大<sup>64</sup>。然而，此協定對中共有其重要性的理由有三：第一，此協定使中共擴大石油出口市場，得到承諾，並確保其能由運費較少的來源，得到現代技術和設備的穩定供給。第二，此協定提供了一個機會，使中共得以改善自一九六五年以來長期持續的對日貿易逆差。第三，此協定對中共有政治和戰略的間接影響。它為中共和日本間長期僵持的和平友好條約的簽訂鋪路；而中共與日本間緊密的經濟聯繫，有助於破壞日本

表(二) 貿易方向和貿易差額  
一九七〇—七六年

資料來源：資料係由理查·巴特薩瓦茲（Richard E. Batsavage）與約翰·大衛（John Davie）所提供之資料。

註(6) 日本貿易振興會中共報導，一九七七年十一月，第十五期，一〇頁以及巴斯薩瓦茲和大衛所提供的資料。

和蘇聯的關係；同時，此協定亦使中共擁有較有利的形勢，以脅迫日本廠商減少與臺灣的經濟關係。

(2) 歐洲經濟共同體。中共基於同樣的理由，企圖擴展歐洲貿易。實際上，中共樂於與歐洲經濟共同體保持緊密的聯繫，是最近局勢的發展。一九七五年九月，中共開拓與歐洲經濟共同體的外交關係。一九七六年二月開始進行貿易協定的初步談判，但是談判却因大陸內部權力鬥爭的激烈而中止。迄「四人幫」被整肅後，華政權顯然決定重新致力於談判的進展。一九七七年，中共的高級貿易官員訪問了英、法兩國的實業機構。北京對法國總理的訪問給予盛大的歡迎。一九七八年四月，中共與歐洲共同體簽訂了貿易協定。協定中要求歐洲共同體給予中共最惠國待遇，並逐漸放寬對中共的進口；而中共對由歐洲共同體進口商品予以適當的考慮。

中共對歐洲經濟共同體的政策，顯然企圖達成經濟上和戰略上的雙重目標。主要的經濟考慮有二。因為中共並非關稅貿易總協定的簽約國，其對歐洲經濟共同體的出口須受配額的限制。同時，中共對於在共同體的一般特惠制度下，享受特惠稅率，似乎缺乏興趣。在新協定下，由於放寬對中共進口的限制，將擴大中共的歐洲市場，而亦有助於減少中共現存對歐洲經濟共同體的貿易逆差。此外，中共對歐洲技術的接觸，將增強歐洲經濟共同體、日本和美國間的貿易競爭，而使中共蒙受其利。同時，日圓的升值導致日本產品價格的高漲，使歐洲經濟共同體成為中共另一重要的供給來源。

但是，中共之對歐洲經濟共同體具有興趣，並非全在於經濟因素。中共視歐洲為對付蘇聯的重要制衡力量。一個堅強和團結的歐洲，足以抑制蘇聯的擴張，並轉移蘇聯在中共邊境上的部份壓力於歐洲戰線。因此，加強與歐洲經濟共同體的聯繫，有益於中共的戰略利益。此外，對於中共而言，歐洲國家亦可提供某些日本所不能、美國所不願供給的軍事技術和武器。

(3) 香港。儘管中共得利於對香港的貿易，但是是否續予香港以充分的供給，却成為急進派和保守派爭論的政策問題。一般認為，對香港保證供給的政策，係決定於周恩來，據傳，曾遭到王洪文的反對<sup>65</sup>。迄「四人幫」被整肅之後，基於經濟上的以及統一並擴大聯合戰線的理由，李強一再地主張增加對香港的供給。

有趣的是，一九七五—七七年，中共與香港貿易的趨勢，並未能符合其政策變動的型態。如表(2)所示，一九七五—七六年間，當總貿易額減少百分之九時，中共與香港的貿易反而增加。此種結果頗令人意外，因「四人幫」一直被認為是極力反對擴大對香港的供給。同樣令人意外的是，在華政權下，中共對香港的貿易僅較一九七六年增加了百分之八。政策型態和實際績效的差異，或許是由於中共出口能量的限制。一九七五年，中共穀物和大豆的產量較一九七四年增加了百分之三，然而，一九七六年似乎只維持在一九七五年的水平<sup>66</sup>。中共與香港的貿易，主要包括食品和農業有關產品的出口，且一般而言，出口總落於生產之後；因此，一九七六年，中共對香港出口的增加之所以較一九七七年為大，這是可以理解的。

註65 李強，見註①，三八頁。

註66 中共·經濟指標，一九七七年，二一頁。

(4) 第三世界。中共與第三世界經濟關係的兩種型態・貿易和援助。一九七〇年代，中共與非共產的開發中國家（除香港外）的貿易，一直穩定於相當低的水平——約佔貿易總值的百分之十九。此種現象絕非不尋常，因開發中國家的貿易，一般總集中在已開發國家，而不是在開發中國家。然而，其他形式的經濟關係，經濟和軍事援助，則有相當重要的意義。自一九七〇年代以來，中共便是一個純粹的捐獻者。這一事實的特色，便是中共殆為世界上扮演捐獻角色的唯一低所得「國家」。表面上，援助的提供是企圖支持這些國家「正當的」鬥爭，並依照毛澤東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教條，來發展他們的經濟<sup>⑥</sup>。實際上，對外援助被利用作為支持革命運動，以及與蘇聯在世界各地競爭政治勢力的外交政策的工具<sup>⑦</sup>。

在「四人幫」被整肅以前，鄧小平集團曾被批評為忽視第三世界國家，這意味着急進派願意與這些國家發展緊密的經濟關係。無論這種批評的真實性如何，當前中共的領導者，却未曾忽略第三世界。根據「新華社」的各項報導，自一九七六年以來，中共對第三世界的技術和經濟援助正在逐步擴大<sup>⑧</sup>。華國鋒在人代會的講話中，再次肯定了中共援助第三世界國家的意圖<sup>⑨</sup>。然而，在不久的將來，中共對第三世界的貿易和援助，是否能有實質的增加，則難以斷言。中共對任何有關外援意圖的聲明，均以謹慎的語氣，附帶說明缺乏此種援助的能力<sup>⑩</sup>。

總之，無可置疑的，目前華政權有堅定的決心和廣大的規劃，來擴展對外貿易。自華國鋒當權以來，迄今已有十八個月之久，其政權所進行的種種努力，並未帶來顯著的貿易成長，這種事實頗令中共領導階層困窘不安。當前的領導者公然招認，必須花費相當的時日，來克服「四人幫」所引起的困難。然而此種說明却掀起了更多的問題：這些困難究竟是什麼？這些困難是否為中共加速貿易擴張僅有的限制？因此，我們將就中共對外貿易主要決定因素的根本問題，加以探討。

### 三 貿易快速成長的展望

中共的進口和出口貿易數量，並非不是分別決定的。自一九五〇年代以來，中共是採取根據計劃的出口數量來決定進口數量的

註⑪ 每日報導（*Daily Report*），一九七八年一月廿一日，A一頁。

註⑫ 中共公然招認，「我國生產的常規武器對國際革命的支援不少」，中共的內政和外交政策（台北：國際關係研究所，一九七四，一四八頁）。關於中共與蘇聯在非洲的激烈競爭，見于子橋（George T. Yu），「中共的衝擊」，共產主義問題（*Problems of Communism*），一九七八年，一至二月號，四〇至五〇頁。

註⑬ 每日報導，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八日，A一頁；一九七八年一月廿一日，A一至二頁。

註⑭ 北京周報，一九七八年，第十期，三七頁。

註⑮ 華國鋒，見註⑪；李強，見註⑫，三四頁，每日報導，一九七八年一月廿一日，A二頁。

表(二) 進口值和出口值，以及出口值和生產值間的關係

因 變 數	自 變 數	樣本期間	截 距	係 數	R	S
$M_t$	$X_1$	一五至一六	負一六·九六	(一·〇三 〇·零四)	〇·九六	三六·一五
$X_t$	$O_{a, t-1/2}$	一五六一七六	負五·〇六·零六	(八·二四 〇·七〇九)	〇·六六	三六·一五
$X_m$	$O_{m, t-1/2}$	一五六一七六	負九·〇三·三三	(〇·七三 一·六三)	〇·九四	三三·一〇
$X_o$	$O_o$	一五至一六	負一·三六·K11	(八·二四 〇·六三)	〇·八四	一八·〇九

- $M_t$  • 總進口值（百萬美元）  
 $X_t$  • 總出口值（百萬美元）  
 $X_a$  • 農產品的出口（百萬美元）  
 $X_m$  • 原油和石油產品以外的原料和製造品的出口（百萬美元）  
 $X_o$  • 原油和石油產品的出口（百萬美元）  
 $O_{a, t-1/2}$  • 落後半年的農業生產量指數。  
 $O_{m, t-1/2}$  • 落後半年的工業生產量指數。  
 $O_o$  • 原油產量（百萬噸）

$R^2$  • 限定係數。

$S$  • 估計標準誤（百萬美元）。括弧中的數字是估計數的標準誤。

資料來源：中共・經濟指標，第三頁和第二十頁・國際貿易手冊，一九七一、一九七四一七七版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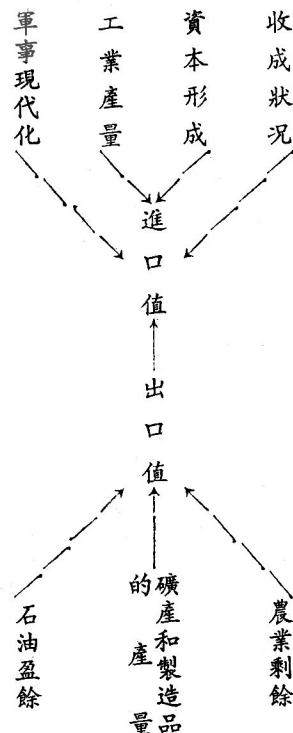
政策<sup>⑦</sup>。目前中共強調限於其能力所能支付的購買方式，顯示華國鋒政權亦採取相同的政策。此種政策意味着出口數量決定了進口數量的最高限制；超過了此種限度，華政權不願、也不能支付。假若華政權決定增加其外援或外匯準備，則實際的進口數量，尤其是在短期內，將低於進口的能量。然而，由已往進出口數量極為接近的情況看來，中共幾乎時常將進口數量擴張到進口能量所限制的水平。根據一九五七—七六年的資料，可求出進口值（因變數）對出口值（自變數）的簡單迴歸，並將其結果列於表(二)<sup>⑧</sup>。極有

註<sup>⑦</sup> 李坡瓈 (Li Po-fang)，「積極強固和組織資源，以支援出口」，計劃經濟，一九五八年，第一期，二九頁。  
 註<sup>⑧</sup> 一九五七年以前，蘇聯的貸款使中共得以維持數年的進口盈餘。這些年資料的列入，勢將歪曲了中共目前沒有外債情況下的進口關係。因此，我們省略了一九五七年以前的資料。

趣的特性，是截距相對的微小而斜率則趨近於一；因此，實際上是一對一的比例關係。

在華國鋒的規劃中，海外技術佔極重要的地位，因此，中共的進口似乎可能擴張到一定的限度。果真如此，則總貿易額幾乎將與出口額作等比例的成長。由此亦導出了幾項重要的問題：倘若中共的進口值決定於出口能量，則出口能量又如何來決定？的確的，在動態的環境中，出口能量並不完全獨立於進口量。進口量對出口量有何影響？除了出口外，又有那些因素足以影響中共的外匯收入？

下列的圖表描繪出一簡單的體系，以用來探討第一個問題。箭頭記號標示出影響的方向。爲了討論方便起見，該圖表示亦列出了決定進口結構的四個主要部門。必須說明的是，圖表兩側所列決定進口或出口值的部門，以及進口值對出口值的影響，都不算詳盡。



表四 主要部門出口的成長一九六六——七六年\* （百分比）

成 長 指 數：	在總出口中所佔的百分比：		
	總 出 口	A 部 門	M 部 門
一九六六	一〇〇〇〇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九七五	一一一	一〇〇〇〇	一一一
一九八九	一一一	一〇〇〇〇	一一一
五六二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五五九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四六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三三七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二九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三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七六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實質上，出口可分成三大範疇：農業和其有關產品，製造品和其他原料，以及石油和石油產品。每一部門對於出口成長的貢獻，可藉着將總出口成長率分解爲三個部門成長率的加權總和，並以個別部門在總出口中所佔的比例爲權數，而看出其相對重要性，亦即

對出口成長的貢獻：	一九七二—一九六六	一四二·五	一四二·四	一四一·七	一·〇五〇·〇
	一九六六—一九七一	一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
	一九七三—一九七六	四二·九	六二·一	三七·一	三五·〇
	一九七七	一九七七	一九七七	一九七七	一九七七

\* A 部門代表農業和有關產品的出口，其中包括食品、油種子、紡織纖維、動物原料、紗、紡織品和衣類。M 部門包括除原油和石油產品外的非農業原料和製造品的出口。O 部門包括原油和石油產品的出口。

資料來源：國際貿易手冊，華府：中央情報局，一九七一年，一九七四——七六年版。和中共：國際貿易一九七六——七七，一九七七。

$$dX/X = S_1 dx_1/x_1 + S_2 dx_2/X_2 + S_3 dx_3/X_3$$

其中  $X$  和  $X_i$  代表總出口值和第  $i$  個部門的出口值， $dx$  和  $dxi$  分別代表其對應的增加量，而  $S_{i1}$  則表示第  $i$  個部門的出口值在總出口值中所佔的比例，亦即  $(X_i/X)$ 。表四列出了 1966 年、1973 年和 1975 年，三個部門的相對佔有率；1966—1972 年和 1973—1976 年間，三個部門的成長指數；以及這兩個時期內，各個部門對出口成長的貢獻。表四的結果顯示，在石油出口以前的六年（1966—1972 年）間和石油開始出口後的三年（1973—1976 年）間，中共總出口值成長的指數大致相同；而每一部門相對的貢獻，則有很大的變動。在一九七三年以前，總出口的成長中，約有三分之二可歸因於農業和有關產品出口的成長；其餘，則是由於非農業原料和製造品出口的成長所造成。然而，自一九七三年以後，這兩個部門的貢獻，分別降低到百分之四十一和百分之二十四，而目前石油出口的貢獻高達百分之三十五。由表四所得到的兩個觀察顯得非常有趣。首先，將來任何總出口計劃不可忽視農產品的重要性。一九七五年，農產品在總出口值中所佔的比例依然高達百分之五十八，約為同年度石油出口所佔比例的四倍以上。農業部門的出口增加百分之五，對總出口成長的影響，相當於石油出口增加百分之二十。其次，一九七三—1976 年間，比較大的石油出口貢獻，乃因石油的出口，係由一個非常小的基數迅速成長所造成的結果。今後，中共石油的出口，將不可能像過去數年一樣造成一百倍的擴張。另一方面，由於石油的較大佔有率（一九七五年，約佔百分之十三），今後總出口對於石油出口的成長，將比已往更加的敏感。

表三列出了這三個部門的出口值對其個別生產量簡單迴歸的結果<sup>④</sup>。顯然地，所有這些情況均有重要的積極關係。出口值對於生產量的彈性大於一；但是，當生產量增加時，則彈性下降。此種緊密的關係顯示，出口能量的問題，主要是決定於生產量的成長，尤其是農業和石油的生產量。為了提供這三個部門已往變動情況的若干概念，表五列出了 1957—1975 年和三個次時期（一九五七—一九七五年和三個次時期（一九七三—一九七六年間，比較大的石油出口貢獻，乃因石油的出口，將不可能像過去數年一樣造成一百倍的擴張。另一方面，由於石油的較大佔有率（一九七五年，約佔百分之十三），今後總出口對於石油出口的成長，將比已往更加的敏感。

註④ 從方法論的觀點來看，若利用多元迴歸或聯立方程式的分析，分析情況或許有所改善。前者可包括其他因素，諸如急進派的反貿易情緒（為虛變數）的分析。後者可考慮許多較複雜和較實際的方法，以用於避免最小平方法所產生的誤差。此種方法對於分析的改善是令人滿意的，但是邊際收益是否來自有限目的的額外努力，則不得而知。此外，所得的資料並不完備，由此而產生的誤差，亦將抵銷了高等分析技巧所帶來的改進。

五七—六五年，一九六五—七〇年，和一九七〇—七五年）內，農業、工業和原油生產量的平均每年成長率。最近數年（一九七〇—七六年），每年成長率的變動情況，亦列於在同一表中。由此可知，一九五七—七五年，農業的成長相當緩慢，平均每年約為百分之二。雖然自一九六五年以來，農業成長率迭有增加，但仍遠低於華政權所設定的百分之四至五的成長目標。此外，由一九七〇—七六年的逐年變動資料看來，中共農業的生產相當的不穩定。在這六年當中，有五年的成長率低於百分之三，甚至有一年為負數。石油生產的情況，頗有不同。和農業成長率的增加相對比，中共石油生產量的成長逐年減緩，由一九五七—六五年間的百分之二十九減緩到一九六五年以後的百分之二十左右。尤其，一九七四—七六年間，成長率竟降低到百分之十三。農業生產的緩慢成長和石油生產的減速，均顯示華政權可能面臨擴大生產的難題。目前，有兩個問題特別重要。第一是關於有多少資源可用於投資（是增加生產能量所必要的），以及投資資源在出口和其他部門間的分配（將直接影響出口的潛力）。第二是關於新技術的有效吸收和普及。

表五 農業、工業和原油生產的平均每年成長率一九五七—七六年  
(百分比)

年 較 前	別 農 業 生 產			工 業 生 產			原 油 生 產			平均每年成長率 一九五七—七六年
	農 業 生 產	工 業 生 產	原 油 生 產	農 業 生 產	工 業 生 產	原 油 生 產	農 業 生 產	工 業 生 產	原 油 生 產	
九五七—七六年	一 ○ 四 八 七 一 四 八 七 一 四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三 二 ○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七 七 ○ 四 四 三 二 一 一 一	四 八 七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二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二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九 五 七 一 七 一 七 一 七 一
九五七—七七年	一 ○ 四 三 二 三 四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七 七 ○ 四 四 三 二 一 一 一	四 八 七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二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二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九 五 七 一 七 一 七 一 七 一
九五七—七八年	一 ○ 三 四 二 三 四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七 七 ○ 四 四 三 二 一 一 一	四 八 七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二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二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九 五 七 一 七 一 七 一 七 一
九五七—七九年	一 ○ 四 三 ○ 〇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七 七 ○ 四 四 三 二 一 一 一	四 八 七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二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二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九 五 七 一 七 一 七 一 七 一
九五七—七十年	一 ○ 四 三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七 七 ○ 四 四 三 二 一 一 一	四 八 七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二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二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九 五 七 一 七 一 七 一 七 一
九五七—七一年	一 ○ 四 三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七 七 ○ 四 四 三 二 一 一 一	四 八 七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二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二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九 五 七 一 七 一 七 一 七 一
九五七—七二年	一 ○ 四 三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七 七 ○ 四 四 三 二 一 一 一	四 八 七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二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二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九 五 七 一 七 一 七 一 七 一
九五七—七三年	一 ○ 四 三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七 七 ○ 四 四 三 二 一 一 一	四 八 七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二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二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九 五 七 一 七 一 七 一 七 一
九五七—七四年	一 ○ 四 三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七 七 ○ 四 四 三 二 一 一 一	四 八 七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二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二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九 五 七 一 七 一 七 一 七 一
九五七—七五年	一 ○ 四 三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七 七 ○ 四 四 三 二 一 一 一	四 八 七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二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二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九 五 七 一 七 一 七 一 七 一

資料來源：中共・經濟指標，華府・國家對外評估中心，一九七七年，第三頁和第二十八頁。為了減輕任何單獨一年農業生產成長率對於收成狀況的敏感性，成長率係根據三年的平均數來計算。例如，一九七四年，一九七五年，和一九七六年三年的平均數，被用來代表一九七五年的生產水平。

### 資源的限制・逐漸增加的個人消費和軍事現代化。

華國鋒集團與「四人幫」間的主要歧見之一是，前者願意倚賴物質的刺激。因此，一九七七年十月，全國百分之四十六的職工，提高了百分之十至十五的薪資。工資增加的直接影響，便是對於消費財需求的增加，使中共需要分配較多的資源於消費。就長期看來，工資的增加必然會擴大農村與都市間生活水準的差距，因而產生提高八億農民消費水平的壓力。

軍事部門對於資源的需求，或許更為重要。無可置疑的，中共意圖追求軍隊的現代化。其爭論點乃在於現代化規劃的規模和速度<sup>⑯</sup>。到目前為止，中共在一九七七年召開了四次，一九七八年召開了二次軍事現代化會議。一九七八年初，一篇直言無諱的文章，強烈地要求加速軍事現代化，並放棄傳統的游擊戰略。該文作者認為，未來的戰爭將是現代條件下的人民戰爭。此種戰爭，將不能「利用腰刀來對抗導引飛彈和其他核子武器」。根據事實，中共武器和設備的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初期是「小米加步槍」，然後「小米加步槍加飛機加大炮」，最後的階段則以「傳統武器加特別武器」為特徵。在較早的階段，中共可由敵人手中拿到武器。但這些日子已成過去。目前，中共是處於第三階段，而必須仰賴其本身的努力，以從事現代武器和設備的研究和生產<sup>⑰</sup>。殆為尋求大力推進現代化的廣泛支持，「紅旗」雜誌亦在同一期間，刊載了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理論組的論文，反應了需要加速發展軍事技術，以適應日益變幻的戰爭目標和複雜性的概念<sup>⑱</sup>。誠然，如果來自軍事部門的強大壓力，導致大量的資源分派於軍事的訓練、研究、發展和國防的生產，則至少在短期間內，將只有較少的資源可用於經濟成長。

軍事用途和生產投資對於稀少資源的競爭，亦不僅限於物質和財政的資源。或許，目前中共較鋼鐵和機器更為缺乏的是技術的人力資源。即使新設備和先進技術的供給並無問題，但是有限的吸收能量和有效地利用新技術以擴大生產，可能形成嚴重的問題。軍事部門對於合格的科學家、工程師和技術人員的大量需求，將使民間部門的情況變得極為嚴重。據報導，正在武漢建造中的西德進口的鋼鐵廠，由於技術人員的缺乏，比預定計劃落後了十八個月<sup>⑲</sup>。

#### 資源的限制：日益增加的內部需求

更精確地說，可供出口的數量，非僅決定於產量而係決定於產量加上國內的利用。在農產品和石油兩方面，國內消費的增加是極為可能的。就農產品而論，國內需要的增加，主要是由於人口的成長。依照美國商務部的估計，一九七〇年代，中共人口的成长開始減緩。因此，就相對條件而言，人口增加的壓力將較已往為低；然而，就絕對條件而言，人口的壓力幾乎毫無減輕。此乃因逐

註<sup>⑯</sup>

關於此一爭論，離題太遠，無法詳加敘述。至於詳情，請參閱：國防工業理論小組，「加強國防建設的戰略方針」，光明日報，一九七七年元月二十日；「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係」，每日報導，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E五至九頁；湛江（Chen Chiang）軍分區，「手槍確能打敗利箭」，每日報導，一九七七年四月十三日，E四至六頁；「小米加步槍萬歲」，每日報導，一九七七年六月六日，E一〇至一頁；「解放軍報社論」，光明日報，一九七七年六月五日；葉劍英，「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五十周年慶祝大會上講話」，光明日報，一九七七年八月一日；「人民日報、紅旗和解放軍報聯合社論」，人民日報，一九七七年八月一日；解放軍報，一九七七年九月二十四日和一九七八年元月二十五日。

註<sup>⑰</sup>

國防科學委員會理論組，「小米、稀飯加步槍與國防現代化相結合」，每日報導，一九七八年元月二十三日，E一至六頁。

註<sup>⑱</sup>

中共貿易報導，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頁。

漸增大的人口基數，抵銷了人口成長率減緩的效果，以致目前每年人口的絕對增加量約與一九五〇年代相若，正如下列數字所示<sup>⑦</sup>：

年	別	總人口（百萬）	增加率（百分比／年）	增加量（百萬）
一九七〇	一、〇〇八	八四〇〇	二·三	二·三
一九七五	一、一三五	九三五〇	二·二	二·二
一九八〇	一、一八八	九八〇〇	二·一	二·一
一九八五	一、二三三	九五七〇	一·九	一·九
一九九〇	一、二二二	九六五七	一·八	一·八

因此，新增加人口的食、衣和住對於資源需要的增加，並不低於二十年前。此外，由於前述的薪資增加，以及較多的適婚年齡（二十五—三十四歲）人口，也可能組成較已往為多的新家庭<sup>⑧</sup>。凡此均可能產生額外的需求。

就石油而論，基於兩個理由，國內石油消費迅速增加的可能性甚至更大。第一，中共領導者預料，最大的石油消費部門——工業（和建設），將比已往更快速的成長。此外，石油逐漸地取代了煤炭，成為最主要的能源。同時，在未來的數年內，當中共一九七三—七五年間進口的石化工廠開始生產時，以石油作為燃料的需求將急遽地增加。第二，中共要求農業機械化的程度，在一九八〇年達到百分之七十，一九八五年達到百分之八十五。此種虛飾的規劃，無疑地將增加農業部門的石油消費<sup>⑨</sup>。一九七四年，這兩部門的石油消費，約佔全部石油消費的百分之九十二<sup>⑩</sup>。假使兩部門的石油消費都增加了，則總消費也將迅速地增加。因此，在其他情況不變的條件下，可用於出口的數量的成長率將較已往為低。

#### 內在的限制：一個概述

華政權加速經濟成長的決心、進口技術和平衡貿易的願望以及結構上的限制<sup>⑪</sup>，可以一個簡單的模式，予以概括在華國鋒的發展策略下，產量的成長對於貿易會有兩種不同的影響。一方面，產量的成長固可增加出口的能量，但因中共不向外借貸，故其出口能量便又決定了進口的限度。另一方面，產量的增加會引起更多的進口需求。因此，中共存有一種足以使出口能量的增加等於進口

註<sup>⑦</sup> 中共：經濟指標，一九七七年，八頁。

註<sup>⑧</sup> 一九七七年，年齡二十至二十九歲的人數佔總人口的比例（百分之十七點九），顯然較一九五三年（百分之十六）為大。見人民保健，一九六九年，第五期，四六二頁；中共：經濟指標，一九七七年，七頁。

註<sup>⑨</sup> 人民日報，一九七八年元月廿九日和三月七日。

註<sup>⑩</sup> 中共：能源均衡計劃（*China: Energy Balance Projections*），華府：中央情報局，一九七五年，三三一頁。  
模型的設計僅作為一個簡略的研究體系。所得到的可用資料，仍無法求得任何有意義的係數近似值。

需求上升的保證產量。此種關係，可藉兩個一次數的線性差額方程<sup>(1)</sup> (First Order Linear Difference Equation) 予以適當的表示：首先，假定出口的能量係決定於總產量，且有一周期的落後：

$$X_t = \alpha Y_{t-1} + b$$

其中， $X_t$ 代表 $t$ 期的出口能量， $Y_{t-1}$ 表前一期的總產量，而 $\alpha$ 和 $b$ 則為常數。

其次，假定生產量的增加和進口量的增加間有一比例的關係：

$$M_t - M_{t-1} = \beta(Y_t - Y_{t-1})$$

其中， $(M_t - M_{t-1})$ 表進口的增加量， $(Y_t - Y_{t-1})$ 表總產量的增加量，而 $\beta$ 為進口增加量和生產增加量之比。又令平均進口量與平均生產量 $\bar{Y}$ 比為 $m = M_t / \bar{Y}_t$ ，而保證的成長率必須 $M_t = X_t$ ，亦即

$$\alpha Y_{t-1} = M_{t-1} + \beta(Y_t - Y_{t-1}) - b$$

或者

$$(Y_t - Y_{t-1}) / Y_{t-1} = (\alpha - m) / \beta - b / \beta Y_{t-1}$$

因等號右邊最後一項，其值極小<sup>(2)</sup>，可以省略。同時，正如 $\alpha$ ， $m$ 和 $\beta$ 所限定的，計劃的產量成長率不能超過保證成長率，否則將違反了平衡的條件。愈高的 $\alpha$ 值和愈低的 $\beta$ 值，將使貿易平衡的保證產量成長率也愈高。

較早的討論顯示， $\alpha$ 值主要決定於：(1)影響儲蓄率的軍事現代化的程度和速度，(2)資源對於與出口有密切關係的農業和能源兩部門的分配，以及(3)這些部門的吸收能量。而 $\beta$ 值主要決定於計劃成長率和產量成長的結構，以及對海外技術、設備和原料供給的需要程度。因此，在資源分配上，華政權面臨了若干難於抉擇的問題。假定華政權意圖加重對海外技術的依賴，則 $\beta$ 值將相對的大。只有以較多的資源投入出口支持部門，而使「 $\alpha$ 」值增加，始可維持高產量成長率的平衡貿易，但這又將剝奪消費者和軍事部門的需要，從而導致對生產力和政治穩定性的不利影響。

### 外在的限制

到目前為止，我們已討論了內在的經濟問題，但這並非擴張貿易僅有的限制。在中共以外，至少有三個地區足以影響中共外貿的潛在成長。

(1)首先是關於促進中共出口成長的兩種主要商品——石油和紡織品的若干銷售問題。由中共的觀點看來，日本是中共石油出口最重要的市場。然而，基於數種理由，日本並未準備無限制地購買中共的石油。來自大慶和勝利的原油，含有相當高的蠟質。每桶

<sup>(1)</sup> 即使 $b$ 之值可能小於一，而總產量勢必比 $b$ 大得多，因此整個項的值將很小。根據中共·經濟指標，一九七七年，第三頁和中共·國際貿易，一九七六年一九七七，第九頁中的一九五二至一九七六年的資料，可大略計算出 $b$ 的值，約為十四億美元，而一九七六年總產量約為三十一百四十億美元。

石油多負擔二至三美元的額外成本，以除去油中的蠟質<sup>⑥</sup>。同時，由於在精煉以前必須混合較輕的原油，因此中共原油的提煉亦有困難。在日本，目前自中共進口的原油，約有一半被充作燃料的用途。如此看來，中共原油含有不良的品質。雖然中共原油含硫磺質較低，但是相對高的氮含量，將產生氮氧化合物而污染空氣。這在高度能源消費的日本，是備受關懷的問題<sup>⑦</sup>。而更嚴重的是，大慶原油並不適合日本所最需要的輕油的提煉，當精煉時，其中只有百分之三十可蒸餾出汽油和揮發油，其餘的百分之七十為重油。目前，中共大規模地投資於特殊分餾設備的建造，以進一步分餾重油。然而，這可能是一項冒險，因為最近十年內，來自新油田的石油，或許將取代大慶和勝利的原油，屆時，中共石油品質將有所改變。最後，日本石油的進口量係取決於其經濟成長率，而最近數年來，日本經濟的成長較已往為緩。基於這些理由，日本向中共進口的增加，仍有許多障礙<sup>⑧</sup>。因此，中共和日本的貿易協定會規定，到一九八二年，中共對日本每年的石油出口，僅有一千五百萬噸，遠低於較早以前，中共所提出的五千萬噸的建議<sup>⑨</sup>。同樣地，對法國或美國的石油出口，亦不樂觀。除了上述的許多技術問題外，距離的遙遠，將使運輸成本較中東原油為高；尤其，目前中共的港口設備仍無法處理大油輪。同時，美國西海岸地區充溢了阿拉斯加原油。中共石油將大量輸往美國的任何臆測，仍屬言之過早。

就紡織品的出口而言，美國、日本和其他國家保護主義的抬頭，將妨礙中共出口的擴張。美國紡織業者協會曾一再要求美國政府，限制中共紡織品在美國的銷售。在日本，部份由於國內生絲業者的控訴，自一九七三年以來，日本對中共生絲的進口急遽地減小。同樣地，一九七五年，澳洲對於來自中共的紡織品，加以配額的限制。

(2)第二個限制中共貿易擴張的主要因素是，中共進口商品（主要是機械設備）價格上升的速度可能較出口產品（主要包括了農產品和消費製造品）為快。一九七三——七五年間，中共與非共國家的貿易條件指數如下所示<sup>⑩</sup>：

年	別 商 品 貿 易 條 件 所 得 貿 易 條 件
一九七〇	八八八·二九
一九七一	八八八·二九
一九七二	八八八·二九
一九七三	八八八·二九
一九七四	八八八·二九
一九七五	八八八·二九

註<sup>⑤</sup> 中共貿易報導，一九七六年四月，六頁。

註<sup>⑥</sup> 中共貿易報導，一九七七年四月，五頁。

註<sup>⑦</sup> 日本經濟雜誌，東京，一九七八年三月十四日，七頁。

註<sup>⑧</sup> 日本貿易振興會中共報導，一九七七年十月，第十四期，一七至一八頁。

註<sup>⑨</sup> 中共：一九七〇年來與非共國家貿易的真正趨勢，華府：國家對外評估中心，一九七七年，三頁。商品貿易條件係出口價格指數除以進口價格指數。所得貿易條件係商品貿易條件乘以出口數量指數。

中共食品對香港的出口價格，可能相對緩慢的上升，因為在中共的對外貿易規劃中，香港是較小却極重要的貿易夥伴；同時，中共必須保持低的工資，以維持在世界市場中香港的競爭優勢。除非對世界其他地區在國際收支上能有順差，否則香港顯然無法忍受對中共貿易的巨額逆差。因此，中共的外貿，主要決定於石油輸出國家組織（OPEC）所設定的石油價格，以及中共進口機械設備和工業原料的先進國家的通貨膨脹率。假若自一九七三年以來的貿易條件持續惡化，則同等數量的出口，將換得數量愈來愈少的進口。

最近日圓對美元價值的急遽上升，亦可能為中共帶來許多難題。由於日圓升值的結果，日本輸往中共的整座工廠與歐洲製造的工廠相較之下，現正喪失其價格的競爭力。因此，中共曾經要求日本放寬延期支付的條件，以抵銷價格的差異<sup>⑩</sup>。假若無法達成雙方信用條件的協議，中共將轉向法國購買<sup>⑪</sup>，而日本亦可能進口較少的中共石油。職是之故，除非出口工廠的歐洲國家增加自中共的進口，則中共的貿易數量勢將減少。

(3)最後，某些戰略因素亦將妨礙中共貿易的擴張。其中之一，乃中共與蘇聯在第三世界國家勢力之競爭。已往，中共曾對這些國家提供巨額的援助。然而，對外援助在中共緊迫需要的資源中是純粹消耗的項目。倘若競爭的形勢加劇而對外援助的數額增加，則中共的進口能量將更為脆弱。

另一個貿易擴張的制度上的障礙，便是（對共產地區輸出）管制委員會（COCOM）的戰略管制。任何與軍事有關的技術，在輸往中共之前，須先取得該委員會的許可。已往，曾有數件運送機器設備的請求，均基於國家安全的理由而被拒絕<sup>⑫</sup>。有時，供給者惟恐招致蘇聯的反對，亦妨礙了軍事設備和技術對中共的銷售。當然，管制委員會（COCOM）和類似的限制，可能限制中共對某些特定項目的購買，而未必妨礙其全部的進口。

由於這些內在和外在的限制，華政權渴求擴展對外貿易的種種努力，並未能在對外貿易部門上，達成引人注目的績效。基於相同的理由，將來中共的對外貿易，能否如若干觀察家所預期的迅速擴展，仍是很大的疑問。

註<sup>⑩</sup> 每日新聞，東京，一九七八年四月一日，七頁。

註<sup>⑪</sup> 中共業已將若干多元醋和合成纖維的購買，由日本轉向泰國。

註<sup>⑫</sup> 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一九七二年三月十八日。